

## 評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 (1931-1945)》

劉得佑\*

書 名：《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

作 者：方勇

出 版 社：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 年

頁 數：312 頁

### 一

2006 年，由於胡佛研究所典藏之《蔣介石日記》的開放，使蔣介石重新成爲中外歷史學者關注的焦點，與蔣介石相關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有所見，中國大陸更出現所謂的「民國熱」或「民國範兒」的現象。<sup>1</sup>在這股研究熱潮下，運用《蔣介石日記》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唯其多半集中在政治與外交領域，經濟領域則多未聞見。僅以《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下）》一書爲例，該書包含三個子議題：〈日記〉中的蔣中正、蔣中正與民國政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sup>1</sup> 黃克武，〈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點反思〉，《國史研究通訊》，3（臺北，2012.12），頁 38。

治、蔣中正與民國外交，共收錄論文三十餘篇，研究成果豐碩，但與經濟議題相關之文章卻付之闕如。<sup>2</sup>

2013 年出版之方勇所著《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一書，在詳實的檔案資料基礎上，輔以《蔣介石日記》中相關資料，使讀者更能清楚理解蔣介石在戰時經濟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蔣氏對經濟問題的思考，誠為運用檔案資料與《蔣介石日記》研究經濟議題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下文擬先扼要介紹其論旨與內容，復次則說明其學術貢獻，最後分別就研究方法、議題選擇、內容論述三方面，略作討論。

## 二

本書題為《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作者旨在透過討論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至 1945 年抗戰結束的 15 年間，蔣介石「經濟政策、經濟思想之內涵」、「經濟權力的增長、表現形式」；以及蔣氏所主導的「戰時的經濟建設活動」、「戰時的經濟統制活動」此四大議題，分析蔣介石參與戰時經濟決策的過程與方式，嘗試釐清蔣介石與戰時中國經濟發展之關係，希冀提供一種理解 20 世紀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模式。

本書除〈前言〉、〈結論〉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戰時蔣介石經濟政策的約束條件〉中，作者分別從孫中山的經濟思想、外在環境與外國經驗三個面向切入，討論這三項因素如何影響蔣介石經濟政策、經濟思想的形成，試圖說明戰時中國為何會走向優先發展國防重工業與統制經濟的經濟建設道路。第二章〈戰時蔣介石經濟權力論析〉首先論述蔣介石透過制度內（非正式組織、部會的領導權、人事安排）與制度外（人脈、社會網絡）的手段擴張其經濟權力的過程，作者認為蔣氏對於顧孟餘與張嘉璈的人事安排，恰能呈現蔣介石透過制度與非制度面的因素擴大經濟權力的作法。其次，作者論及蔣介石經濟權力的表現形式，指出蔣

---

<sup>2</sup>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下）》，（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0）。

氏多透過「手令」與「演講」表達其經濟思想、介入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第三章〈蔣介石與戰時經濟建設〉分別從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資源委員會與工業建設、戰時的交通建設三個議題，析論蔣介石在戰時經濟建設活動中的主導性地位，並論及蔣氏運用訓令、文告等方式影響經濟建設的過程。第四章〈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統制〉則以四川的財政整理運動、〈加強物價管制方案〉的制定與實施、戰時糧食統制三個歷史事件為例，分析蔣介石的經濟權力如何介入經濟政策的訂定，使戰時中國逐漸走向統制經濟的發展道路。透過三、四兩章的討論，作者認為，蔣介石對經濟建設的推動與支持，方使戰時中國的工業化、交通建設卓然有成。而蔣氏對四川財政的整理、大後方的物價管制與糧食統制，則有助於戰時經濟環境的穩定。此外，藉由對蔣介石經濟活動的深入考察、研究，實有助於重新思考 20 世紀中國「個人角色、國家與戰時經濟發展」三者之關係。

在〈結論〉中，作者分別從制度變遷與經濟現代化的角度評析蔣介石的戰時經濟政策。作者認為 1931-1945 年的中國，實歷經「由平時經濟轉向戰時經濟、自由經濟轉向統制經濟」的經濟制度變遷歷程，促成此種變革者，實為身處權力核心的蔣介石。蔣介石重視工業建設、交通建設、科學管理的經濟政策與建設活動，實具有經濟現代化的特質。但在予以肯定的同時，作者亦從市場經濟的健全與否、個人主體性與政策無法貫徹三點說明蔣介石戰時經濟政策的侷限。

### 三

以往學界對於民國經濟史的研究，大多以國民政府作為論述的基點，對其經濟政策、活動進行考察，少有以蔣介石作為中心的專題研究。如張連紅著《整合與互動：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研究》、吳景平編《上海金融業與國民政府關係研究》、趙興勝著《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企業研

究》、徐建生著《民國時期經濟政策的沿襲與變異（1912-1937）》等書，皆是以國民政府為主體的研究成果。<sup>3</sup>以蔣介石為主體的研究成果，則大多集中在幾個重要議題：如蔣介石與江浙財團；蔣介石與金融機構之關係；蔣介石與孔祥熙、宋子文的衝突與合作等，但除少數幾本專著論及外，多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呈現。<sup>4</sup>

相較於上述的研究成果，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一書的出版，其意義主要有三，新的研究視角、新資料的使用與新的研究課題。首先，在研究視角方面。方勇選擇以蔣介石作為主體，考察蔣介石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與戰時中國經濟建設之關係，此種兼具理論與實踐的討論模式，有別於以往著重於單一事件與思想的研究。此外，作者選擇1931-1945年作為時間斷限，不同於過往抗日戰爭史研究以「八年抗戰」作為時間斷限，其著眼於歷史的連續性（頁2），實有助於釐清蔣介石的經濟政策隨著外在環境變化的歷程。如蔣介石於1937年的〈抗戰建國綱領〉中提出戰時中國應該實施計畫經濟，對金融等產業進行統制。<sup>5</sup>此一策略若不從蔣介石於戰前與義大利籍財政顧問斯坦法尼（Alberto De Stefani）的互動，以及蔣介石對於蘇聯經濟體制的認識切入討論，實無法說明形成過程。

其次，在史料運用方面。作者除大量使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官方檔案資料，以及各地檔案館出版的史料彙編外，亦注意相關報刊、年譜、回憶錄等資料。其中最引人注目者，當為

---

相關研究成果眾多，此處不一一列舉。除此之外，學界亦已有關於抗戰經濟史的研究綜述，如鄭起東，〈1995-2005：抗日戰爭時期經濟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3（北京，2008.9），頁217-253。

<sup>4</sup> 在專書方面，如楊格著、陳霞飛譯，《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小科布爾著，蔡靜儀譯，《金權與政權——江浙財團與國民政府》（臺北：風雲論壇，1987）。等書皆有論及文中所提的相關議題，但因著作並非以蔣介石為主體，所以對於蔣介石的經濟思想、經濟活動並未進行深入討論；在期刊論文方面，如橫山宏章著、段梅譯，〈蔣介石與上海交易所——股票經濟人時期〉，《史林》，1（上海，1996.3），頁60-68+34；曾瑪麗，〈節約、消費和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的社會經濟思想研究〉，《亞洲研究》，64（香港，2012.2），頁251-272。其餘相關研究成果可參陳紅民，何揚鳴，〈蔣介石研究：六十年學術史的梳理與前瞻〉，《學術月刊》，5（上海，2011.5），頁149-150。

<sup>5</sup>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光華通信》，5（四川，1938），頁4-11。

美國胡佛研究所典藏之《蔣介石日記》。作者透過日記材料，使讀者更爲清楚掌握蔣介石對經濟問題的思考，如作者論述1932年蔣介石爲籌組國防設計委員會，與知識分子、實業家於廬山見面一事時，使用日記說明蔣介石對於經濟學家馬寅初談話內容之反應，以及與錢昌照討論「俄國五年計畫」的過程（頁64）。以往學界在討論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籌組時，多著重於翁文灝與蔣介石的互動、談論的內容。<sup>6</sup>此係翁文灝留下的〈回顧往事〉一文曾有提及，而其他的實業家或知識分子皆未留下相關記錄。因此，蔣介石日記實有助於彌補此段空白。

最後，在研究議題方面，作者亦有所創新。雖然作者在書中所討論的部分議題，如資源委員會與戰時工業建設、戰時的交通建設、戰時的糧食統制等多有專文論及，但多集中在經濟建設的實踐面，較少涉及蔣介石「如何影響這些建設活動的運作」及其中的權力關係。此外，作者所選擇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四川省財政整理運動」則是學界甚少研究之議題，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處。

#### 四

在說明本書的學術貢獻之後，以下試就本書之研究方法、議題選擇、論述內容三個方面略作討論。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回到本書所欲討論的問題，即「釐清蔣介石與戰時中國經濟發展之關係」。作者透過相關議題之論述，的確突顯出蔣介石企圖透過其權力的開展，影響戰時中國的經濟建設。然而作者於結論中似有過度解釋之嫌。如文章中利用「抗戰勝利」此一歷史事實證明蔣介石的經濟政策必然具有無可置疑的合理性與績效（頁274）；同時亦將國民黨迅速崩潰的原因歸因於蔣介石經濟政策在戰後的延續，以及蔣介石經常利用手令越級指示使下屬缺乏主動性，進而影響經濟運行效率。（頁284）作者將國民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成

---

<sup>6</sup> 王衛星，〈國防設計委員會與中國抗戰的經濟準備〉，《南京社會科學》，10（南京，1995.10），頁14-17。

敗得失大部分歸因於蔣介石的經濟政策與其施展經濟權力之手段，顯然忽略政策執行的人為條件、外在環境對於整體經濟建設活動的制約等因素，似有失公允。如在作者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論述中，彷彿蔣介石的手令一出，便能夠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人事安排。果真如此，蔣介石應不會於 1941 年的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上如此批評：「現在無論中央或地方，一班文武公務人員，每當奉到上級命令的時候，如稍遇困難，不是說行不通、不能辦、不容易辦……隨便擱置了事」<sup>7</sup>

本書的研究著實呈現了蔣介石在經濟決策中的靈活性與主動性。除了「以蔣介石為中心」之研究方法，作者亦於前言中提出本書欲透過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進行研究。然縱觀本書，作者對於理論的運用方式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如頁 23，作者提出「理性人假設」概念，並將其定義為：「一個決策者在面臨選擇時，總會做出他所認為的最佳選擇。」據此指出蔣介石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與統制經濟體制的建立，為蔣介石所做出的「理性」選擇。然作者又於頁 80 提及蔣介石認為戰時推行重工業與統制經濟制度是各國的通例，中國亦不能例外，此為外國經驗對於蔣介石經濟決策的約束。僅從作者的論述出發，便可以知道蔣介石在做出選擇時，亦有受國際潮流之影響，而非僅是蔣介石「個人」的「理性選擇」。

此外，在頁 140，作者分析蔣介石經濟政策的主要類型，其架構係採經濟政策學中對於公共政策的分類，即按層次分為總政策、基本政策與具體政策三類，並據此進行分析。但書中對於總政策與基本政策兩者的區分似不夠明確，如作者將蔣介石於 1935 年 9 月 16 日所發表的〈物質建設之要義〉演講歸類為總政策，將 1937 年 7 月 18 日發表的〈建國運動〉演講歸為基本政策，然而兩份演講稿的內容似無明顯區別，試表列如下（頁 140-144）：

---

<sup>7</sup> 蔣介石，〈本屆財政會議之任務與實施土地政策之必要〉，收於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言論思想總集》，第 18 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 219-220。

演講題目	〈物質建設之要義〉	〈建國運動〉
演講時間	1935年9月16日	1937年7月18日
主要觀點	1. 實施平均地權 2. 節制私人資本 3. 發達國家資本	1. 實行平均地權 2. 防止資本操縱 3. 促進勞資合作 4. 發達國家資本 5. 解決生產與分配問題

由上表可知，兩篇演講稿的主要觀點幾乎雷同，且在〈建國運動〉演講中蔣氏更進一步提出促進勞資合作、解決生產與分配問題兩項主張。兩篇演講稿所提出之主張，似皆符合作者所提出之總政策的定義，即：「由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制定出來，並要求整個國家在一個較長歷史時期中堅持貫徹落實的政策。」<sup>8</sup>

在議題選擇方面，作者於各章討論相關議題時，有時並未明確說明選擇該議題進行討論之原因，其所選議題亦有可供商榷之處。如第二章討論蔣介石透過人事安排彰顯或擴張其經濟權力時，作者選用顧孟餘與張嘉璈為例作為說明，之所以選擇二人，作者僅以「主要是考慮到兩人與蔣介石既非姻親，但又居經濟部門要職，對於分析蔣介石經濟權力之人事安排更具代表性」一語帶過。（頁107）此種說法似略嫌簡略。張嘉璈案係為張氏拒絕蔣介石改組中國銀行而起，最終張氏辭去總經理一職，確如作者所說，可以用來分析蔣介石經濟權力擴張與人事安排之間的關係。但顧孟餘案實為一場由貪汙所引發的案件，主要焦點為行政院與監察院之間的政治角力。在這場派系鬥爭中，蔣介石力保顧孟餘的原因在於維繫與汪派的合作關係，並藉機提升自身的政治影響力。<sup>9</sup>其目的並不如作者所說，是為了透過人事安排來擴張其經濟權力。

除此之外，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議題選擇上，實凸顯作者處理「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之侷限性。不可否認的是，作者所挑

<sup>8</sup> 蔣介石，〈建國運動〉，收於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4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589-590。

<sup>9</sup> 段智峰，〈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1（南京，2011.12），頁103-110。

選之子議題，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資源委員會與戰時工業建設、交通建設；四川財政整理運動、加強物價管制方案、戰時糧食統制，皆為重要的歷史議題。然而第三章與第四章章名分別為〈蔣介石與戰時經濟建設〉、〈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統制〉，戰時經濟建設與統制活動的相關議題包羅萬象，實非兩章的篇幅所能涵蓋。

且如〈交通建設：以公路建設為中心〉一節似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資源委員會與戰時工業建設兩節所要論述的工、礦、商業建設活動差距較大。至於，作者於該節中使用相當篇幅討論之滇緬公路建設，其固有維持戰時經濟運作之功，然其意義實在於國防與戰略價值。<sup>10</sup>作者將其歸於經濟建設活動是否適宜，值得討論。作者若能改以其他由蔣介石主導的經濟建設活動為例，應能使章節脈絡更為流暢。<sup>11</sup>

在書中內容部分。首先，筆者認為，作者在分析蔣介石經濟政策、經濟思想的形成時，忽略了傳統因素對於蔣介石經濟思想之影響。如作者分別於第三章、第四章提到的，蔣介石於 1940 年代開始推行驛運制度與田賦徵實，用以解決抗戰時期的交通與糧食問題。然此兩種制度並非現代產物，係在傳統中國行之有年，且隨著現代化的洪流消失在歷史舞台上。<sup>12</sup>為何蔣介石在面對抗戰困境時，會選擇重新推動這兩種制度？或許可以就此一問題作為切入點，思考傳統經濟制度、思想對於蔣介石經濟活動之影響。

再者，在第三章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一節中，作者似乎僅集中討論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理念與實施要領，卻未論及蔣介石相當重視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實行機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該委員會的章程係由蔣介石親自制訂，並自任總會長。<sup>13</sup>

<sup>10</sup> 李君山，〈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33（臺北，2012.9），頁57。

<sup>11</sup> 如蔣介石於 1938-1942 年間，為促進四川與西康兩省的經濟建設，曾推行一連串的經濟建設活動，如成立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組織川康興業公司等。

<sup>12</sup> 1913 年民國政府下令將驛站全部裁撤，詳參陳紅民，〈抗日戰爭時期的驛運事業〉，《抗日戰爭研究》，1（北京，1997.3），頁158。

<sup>13</sup>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

此外，蔣氏命令該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鼎昌定期向其報告各分會成立進度，<sup>14</sup>其用心可見一斑。該委員會的成員則涵括黨、政、商、學各界精英。<sup>15</sup>從號令之成員組成，實可看出蔣介石欲透過此一委員會，動員各方資源從事抗戰之企圖。是故，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亦是釐清蔣介石戰時經濟建設思想的重要環節，若僅分析該運動的理念與實施要領則稍嫌不足。

最後，筆者認為作者在政策執行與實踐面的分析較為缺乏。如作者在討論蔣介石推行「田賦三徵」時，運用大量的手令指導相關工作的推行：核示《糧食部施政計劃綱要》、指示徵購軍糧辦法五項、督促對各省徵實的準備工作等。然作者似未及於思考這些徵購軍糧辦法、糧食統制政策在執行上是否碰到阻礙？以及實行地區對於政策的反應。同樣地，在分析四川善後公債的發行辦法時，作者僅以蔣介石、孔祥熙兩人的往來電報為主要材料，善後公債的發行者劉湘、劉航琛、關吉玉等人在這場討論中卻不見蹤影。<sup>16</sup>

總體而言，本書藉由豐富的檔案材料，企圖較全面地討論蔣介石的經濟政策與戰時中國經濟發展之關係，釐清 20 世紀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透過本書的研究，蔣介石作為一位經濟建設指導者的形象躍然紙上。作者對其經濟政策、思想之形成；經濟權力的擴張；戰時經濟建設、統制活動等皆有紮實的論述與分析。就此而言，本書無疑是研究蔣介石與戰時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重要著作。

（責任編輯：王信杰 校對：吳彥儒）

---

00114-015。

<sup>14</sup>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五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78-125。

<sup>15</sup>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會，《會務叢刊》（南京：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1937），頁105-107。

<sup>16</sup> 如 1937 年抗戰爆發前夕，四川省因災害發行四川賑災公債時，寧、川雙方即有經過詳細的討論，過程與討論結果詳參黎志輝，〈川謠、川災、川政——抗戰前夕四川的統一化過程〉，《抗日戰爭研究》，4（北京，2009.12），頁64-69。

## 引用書目

### 一、檔案

-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114-015。
-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五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78-125。

### 二、史料文獻

-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光華通信》，5（四川，1938），頁 4-11。
- 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言論思想總集》，第 18 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 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14 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會，《會務叢刊》，南京：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1937。

### 三、專書

- 小科布爾 (Parks M. Coble) 著，蔡靜儀譯，《金權與政權——江浙財團與國民政府》，臺北：風雲論壇，1987。
-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下）》，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
- 楊格 (Arthur N. Young) 著，陳霞飛譯，《1927-1937 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四、期刊論文

- 王衛星，〈國防設計委員會與中國抗戰的經濟準備〉，《南京社會科學》，10（南京，1995.10），頁 14-17。
- 李君山，〈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33（臺北，2012.9），頁 57-88。
- 段智峰，〈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 1934 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1（南京，2011.2），頁 103-110。
- 陳紅民，〈抗日戰爭時期的驛運事業〉，《抗日戰爭研究》，1（北京，1997.3），頁 157-171。
- 陳紅民，何揚鳴，〈蔣介石研究：六十年學術史的梳理與前瞻〉，《學術月刊》，5（上海，2011.5），頁 147-154。

曾瑪麗，〈節約、消費和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的社會經濟思想研究〉，《亞洲研究》，64（香港，2012.2），頁 251-272。

黃克武，〈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點反思〉，《國史研究通訊》，3（臺北，2012.12），頁 38-42。

鄭起東，〈1995-2005：抗日戰爭時期經濟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3（北京，2008.9），頁 217-253。

黎志輝，〈川謠、川災、川政——抗戰前夕四川的統一化過程〉，《抗日戰爭研究》，4（北京，2009.12），頁 64-69。

橫山宏章(Hiroaki Yokoyama)著、段梅譯，〈蔣介石與上海交易所——股票經濟人時期〉，《史林》，1（上海，1996.3），頁 60-68。